



龙头新闻·妙赏

“野草莓丛书”第五辑

黑龙江文学馨香依旧色彩纷呈(上)

10

黑龙江日报

2021年3月26日 星期五

周末

妙赏

扎根俗常，向着阳光生长

读程琳作品集《我爸爸》

乔焕江

由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策划、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野草莓丛书”第五辑，包括程琳的作品集《我爸爸》、仇立国的中短篇小说集《阁楼》、闫逸的诗集《仿佛或恰恰相反》、杨勇的诗集《镜中的浮士德》、孔广钊的短篇小说集《太平，太平》。这五部作品体裁以小说和诗歌为主，内容各具特色，是五位作家近几年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是他们多姿多彩的创作风格的生动呈现，是黑龙江省作家文学实力的又一整体展示。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邀请五位文艺评论家对本辑五部作品进行“一对一”式评论，本报特刊出五篇评论文章，以期助力宣传和推广黑龙江文学，推动我省作家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



对自我认知的多层次展现

闫逸诗集《仿佛或恰恰相反》读后

陈爱中

在二十余年对汉语新诗的观照中，我一直认为哈尔滨是能够也应该出大诗人的城市。黑土地上浓郁的森林、古朴的田野、开朗豁达的人群、俄罗斯色彩的异域文化、关内的传统移民文化和土著的乡土文化的杂糅，都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哈尔滨新诗的意义指向的错综复杂性、美学特征的高辨识度中体现出来。省作协向来重视对这种成绩的梳理和推出，先后推出五辑“野草莓丛书”，都给予诗歌较为充分的表现位置，优中选优，故而基本都是这个领域的精品，包临轩、张曙光、桑克、杨勇、冯晏等等都曾在这个系列里亮相，分别代表着不同年龄段、不同美学风格的创作实绩。

第五辑中自由撰稿人闫逸的这本《仿佛或恰恰相反》依然是秉承前几辑的选材风格，偏重于都市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写作，重玄思、哲理指向的丰富性，强调文本生成的复杂性和综合性，让这本诗集有较深的都市化气息和思辨色彩。

从内容量上说，诗集选择的多为三四十行以上的长诗，语言结构可以容纳更为丰富的内容，让诗人可以为从容地展现较为复杂的情绪或者哲理提供足够的空间，这也让这本诗集显得较为厚重，信息量大，而且语感极好，游刃有余。如《万物花开》中，将婴儿出生之后，来自父亲的那种幸福感和爱意综合各种感官效应来表现，“钟声从词语里睁开眼睛，/小提琴上的田野/在风中荡漾”，为听觉和视觉的通感，“寂静越听越深，从你的梦听到/萨福的古希腊月亮，从你的名字/听到杨炼的茫茫大海”则是将这种感情经验做超越时空的关联，随后诗人写到的牙牙学语，人生历练之后的自我辩驳，成长过程中各种认同设想的累积，等等，一份基于过去经验之上对雅弱现实的复杂情感的寄寓，流泻于理性整肃的框架内，深刻而从容。从这种冷色调的叙述格调中，我们在诗集中触摸到作者经常反观的自我，比如《一个精神艾滋病患者说》实现了对自我认知的多层次展现，“我是一个灰暗的故事/到处都在阅读”，或者是“我发现我消失得如此彻底/连我的意愿和举止/都被篡改了”，亦或者是“我看见整个冬天空旷得只剩下/吸收着寒冷的房屋和街道”，最后是“我失踪了”/“我的眼泪被你原因不明地流着”，以象征主义的无边隐喻方式，将生理艾滋病的现实境遇移植到精神的困境里，从而映现现代人或孤独或自闭的灵魂煎熬，一种人人被隔离和自我隔离的灵魂境遇。这种反思显然是哲学的，以情感客观化之后的更为锐利的视角审视作者的生存困境，这是这本诗集不少诗篇最为值得赞赏的地方。

以诗歌的方式提出问题，然后运用多种感知方式展现出来，并不追求问题的逻辑推理和因果诉求，这自然是现代诗先锋试验性的重要特征。在这点上，《仿佛或恰恰相反》是有一定追求的。比如《苍蝇日记》《猫眼睛里的时辰》《秋天：镜中的谈话或开场白》等诗篇中，选取变异性的观察和体验世界的视角，在写作手法上运用各种直接和间接意象的杂陈，时空错杂之后的幻觉，现实与超现实经验的交融，等等，彰显出作者具有较为熟练的语言处理技巧和锐意创新的诗学理念。德国哲学家洪堡特认为，语言的定义永远只能是发生学上的定义。体现在文学实践中，真正能够承担并完成这个使命的，只能是不停追求经验的更新和语义丰富性的诗歌，这也是黑格尔区分散文和诗歌的文体特征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仿佛或恰恰相反》是很好地彰显诗歌的这个意图的。

自我对话或者一个人的玄思，是现代诗最为迷恋的方式之一，从自我镜像的惊讶，对自然之物的重新发现，等等，

不一而足。如何处理现代视阈下同代人、同类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基于个体经验的丰富性而非现实实存关系的如实展现，是传统汉语诗歌中的“赠诗”获得现代性的重要特征。阅读、聆听，进而让想象介入获赠者的某些经验或者隔空的对话，并不渴求获赠者在同一时空内的应和或现实认同，这种写作行为一方面拓展了诗人的写作空间，另一方面也让诗歌文本有了另一种复杂的可能性。《仿佛或恰恰相反》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比如《雪或动机修辞学——给欧阳江河》，整首诗中使用的“雪”“虚无”“石头”“肖邦”等意象，都是诗人欧阳江河在诗歌创作中常使用的，尤其是他的那首《一夜肖邦》几乎凝聚了肖邦的音乐和命运中最值得听者颤栗的部分，“琴声如诉，耳朵里空无一人”，“这已经不是肖邦的时代，/那个思乡的、怀旧的、英雄城堡的时代”，等等。实际上，闫逸将欧阳江河诗作中的意象拿来，按照自我想象的逻辑加以重组和规整，这首诗就呈现为一种个体经验基础上的活语复调，欧阳江河的现世、诗歌世界和诗人作为读者对其的想象，这些都构成了这首诗的“知识性”和层叠性，是为现代智性诗的良途。那首《阅读简史——给吕新》是这样，《向雷蒙德·费德曼致敬》《巴黎书信：茨维塔耶娃，1926》《华莱士·史蒂文斯》《玛丽亚·尤金娜》等都是这样。如果翻翻新世纪以来的汉语新诗写作倾向，对经典文本和作家的阅读，进而以诗歌的方式建构新的认知经验，是众多诗人创作的一个必然而又有效的办法，尤其是对于带有“知识分子写作”倾向的诗人而言，“野草莓丛书”中的诗集大多如此。

另外想说的是，读闫逸的这本诗集《仿佛或恰恰相反》，脑海中总不断地涌现出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解构主义弥漫开来的，对文学生成和评价上的消解与分裂的非本质化美学特征，远离能够产生本质的共识，在自我的航线里奔向远方，似乎越来越明显。或者说，当我们总是以回归本体的角度来评价90年代以来的汉语新诗，在“个人化写作”的褒义指向下，强调其叙事性或者抒情的客观化、隐喻的必要性等内涵的同时，究竟该怎么处理由此而造成的诗人、诗歌文本、受众或者说时代之间的分裂性，似乎并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不同诗学倾向之间，不同诗人之间，在经验自我和词语自我中让创作理念矗立塔尖。诗歌生成场域的沙龙化，文本在实验性的个案中走向更为艰深的路途，让汉语新诗的写作越来越彰显出荷尔德林说的那句“写诗是最无用的职业”的存在意图。但相对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总感觉新世纪以来的汉语新诗缺点什么。

仿佛或恰恰相反

作家程琳的另一重身份是人民警察，其作品专注于警察题材。写下这句看起来并没有错误的表述，却总是让人觉得有些不对劲，仿佛遗漏了什么重要信息。尤其是在读完新近出版的《野草莓丛书》中程琳作品集《我爸爸》之后，这种感觉越发强烈而明晰。

程琳当然是位作家，而且是龙江这片黑土地上优秀的作家，我们经常能在《收获》《当代》《十月》等文学期刊见到他出色的小说，也时常在电视屏幕上见到由他担纲编剧的一部又一部优秀的电视剧；他的警察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结局又时常出人意料，被誉为警察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作家。然而，一旦我们沉入到他那些由警察故事撑开的世俗空间和情理世界，那些纯粹猎奇的对于警匪斗争罪案探秘的阅读心理反而退居其次。在程琳烟火气十足的叙述中，一个个案件、警察和犯罪嫌疑人不再只是为推动情节前行而设置的抽象或固定的符号，相反，他们像是从更为俗常的生活世界中生长出来，人物的表情、语言、行动和情感意愿，事件的发生、回转和结局，都无一例外地展示出与生活本身枝枝蔓蔓的连接和缠绕。那些一旦开始阅读便欲罢不能的案件故事，更像是一条条通往社会肌理和时代氛围的隐微路径，通过它们，读者得以触摸的，是时代喧嚣外表下世相的复杂难言，是历史宏大行进间步履的踟躇迟疑，是那些在黑夜中或边缘处却向阳生长的愿望，是那也许音量并不总是宏大，但却兀自跳动的不息的凡俗人心。那些尘烟滚滚中面容并非来自日益内化的作家自我情绪的凌空虚蹈，那些曲折跌宕的警察故事也并非超逾常人想象的警界秘闻之雪泥鸿爪，因此，对于程琳确切的定位也许更应该这样说：他是一位写作中的警察，也是通过警察身份书写时代的写作者。

程琳的警察故事不同于一般的探案传奇。虽然两者都需要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但在程琳这里，通过警察故事呈现离奇事件背后俗常的因果肌理以及时代氛围下的社会情绪心理，才是其作品的最终效果。小说《警服》和《谋杀》都体现出达致这一效果所运用的叙事策略。在《谋杀》中大流氓刘长江被枪杀案件的追凶历程本身足以达到吸睛效果，整个案件从一波三折到最终水落石出的过程确实也构成驱动情节演进的线索，但作者却用更多的笔墨讲述胆小怕事的企业家徐冰如何转变成新任流氓，揭示樊丹樊东的姐弟情谊与樊东杀人的情感历程，描写刑警苏岩与领导和同事间微妙的单位人际关系，苏岩与樊丹的情感发展则干脆与追凶故事嵌套在一起。《警服》则是从刑警陆洪由便装到着装的变化入手，关涉到警察与群众的关系，牵扯出他对女儿的厚重父爱，最终在地震灾难中引发对警察工作伦理的深度体认。由此，那些最终以偶然和离奇的方式在社会中引人惊异的事件，在更为细致翔实的日常情感和情绪的转换勾连中最终得到同情式的理解，相应的，在与

故事人物共情的过程中，俗常世界中人的情绪和情感、困惑和抉择，也有有机地关联成理解这个时代的可触摸的实在基底。

与此同时，正是由于将故事主人公放置在多样社会关系和层叠日常情感的纠葛中，程琳笔下的警察形象也成功地摆脱了标签式的固化，他们不再只是从光荣榜上直接走下来的棱角英雄，而是仿佛随时可能与之擦肩的小区邻居，跟我们一样生长在烟火气浓厚的城市街巷，一样有着工作的压力、情感的牵系、性格的弱点以及对时代的困惑。这样的警察形象无疑更为可感，他们的节操和信念并非天然自具，而恰恰是与周遭世界日常情感交流的结果。正因如此，当这些可感可触的警察遭遇极端情境，对于他们在凡人情感与职业伦理的矛盾中如何抉择乃至做出牺牲，读者自然会反身自问而产生同情式的理解。警服在身的陆洪在倒塌的校园中为顾全大局不得不克制自己抢救女儿的冲动，他内心的情感纠葛同时也在读者的内心激起难以平息的波澜；苏岩与女友樊丹相拥痛哭的声音也撕扯着读者的心脏。可敬因为可感可亲而更为可信，更重要的，因为明了这些警察所守护的正是他们所得以生长的日常情理世界，人们对警察的理解也就摆脱了冰冷的现代国家机器的标签式定位，由此，人民警察这一称号的别致意味得以彰显。

因为笔触所及是一个时代泥沙俱下的社会底层，警察题材必然要处理暴力犯罪伤害死亡等等诸多社会负面事件，程琳的作品却显然没有因此而导致更多的压抑和不适，相反，倒是总让人感受到穿透芜杂世相晦暗生活的亮光。在他的系列警察故事中，沉重和压抑时常被风趣的对话机锋和轻快的叙事节奏冲淡，种种矛盾与危险不时为主人公的洒脱行事消解，人民警察的负重前行更添许多积极和坦然。应该说，作品叙述笔调和情感态度中这种积极和坦然也是识别程琳警察故事的重要特点，它显然缘于叙事者的主动参与而不是冷眼旁观。写作者总是内在于他所书写的现实而非某种既定的写作传统，他的文学生产必然同时在参与现实的再生产。程琳正是在写作中成为这样一位自觉者，他并没有陷入某种作家身份的幻觉位置，小说之外，他也调整姿态不断“触电”，在经历过短暂的不适后，很快就成为多部热播剧的优秀编剧。在《国家行动》的日记中，他说：“写完了电视剧，写完了电影，写完了小说，有两句活就这样留在了我心里：本来狗屁不是/不要自以为是。”

从晦暗未明处开始，但却始终向着阳光生长。这不是一句简单的鸡汤，而是扎根于俗常不息的情感热望。作品集里同名散文《我爸爸》碎玉零瓠，浓缩了程琳开启警察生涯的情感前史：相依为命的父子，为不受人欺负而考进公安院校，这个私下的或偶然的开端，最终却为我们造就了一位洒脱可爱且笔耕不辍的人民警察。

责编：曹晖
(0451-84691037)
执编/版式：杨铭
(0451-84655106)
美工：倪海连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龙头新闻·妙赏

